



李光耀



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

李光耀

回忆录

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

出版及发行

新加坡 联合早报

仁定巷82号 新加坡349567邮区

电话: (65) 7438800

传真: (65) 7476993

承印

新加坡金合利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初版

2000年9月16日

定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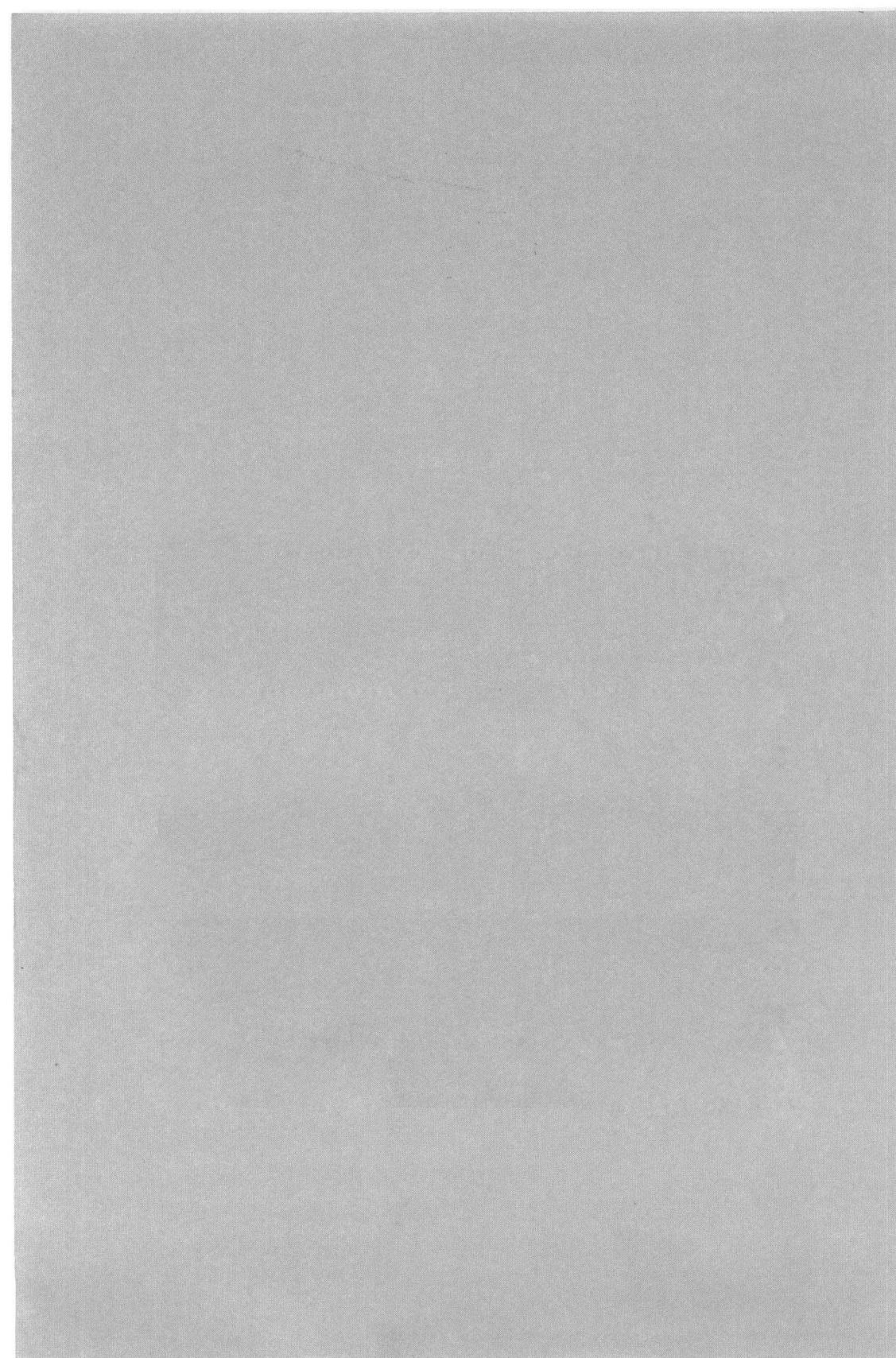
新币32元(含消费税)

国际书号

981-04-2978-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本书献给我的老战友吴庆瑞、
拉惹勒南、韩瑞生、林金山、巴克、杜进才、
王邦文和奥斯曼渥。
他们共同缔造了新加坡的故事。



目 录

序言	7
1 走自己的路	11
2 好男要当兵	21
3 英军撤退	41
4 绝处求生	59
5 金融中心的故事	83
6 工会脱胎换骨	97
7 我们不搞施舍	111
8 共产党的衰亡	127
9 砥柱中流四十年	141
10 婚嫁大辩论	157
11 一种共同语	169
12 铁腕护廉洁	183
13 城在花园中	199
14 政府和媒体	213
15 拿起指挥棒	227
16 新马关系风云变幻	253
17 同印尼化敌为友	287
18 泰菲与文莱	323
19 中南半岛的沧桑	341
20 亚细安的未来	363
21 东亚货币危机	379
22 共和联邦俱乐部	389
23 英国的首相们	413

24	相知说澳纽	427
25	南亚传奇	447
26	在欧盟留下足迹	469
27	看苏联怎么垮台	489
28	同美国打交道	501
29	后冷战的新世界	523
30	冷战后的分歧	543
31	亚洲第一个奇迹	559
32	向日本人学习	581
33	韩国人自强不息	593
34	香港的回归	607
35	台湾何去何从	623
36	尾巴特长的中国龙	639
37	邓小平时代	663
38	北京城外看神州	687
39	天安门事件之后	697
40	走向富裕的中国	719
41	交棒的时候到了	737
42	我的家庭	751
43	后记	763
	李光耀纪事年表	772
	索引	776
	鸣谢	791
	名人读《李光耀回忆录》	794

序言

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把国家的稳定、增长和繁荣视为理所当然，是我写书的动机。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没有天然资源、面积只有640平方公里的小国，要在比它大，而且都推行民族主义政策的新独立国家包围的环境下生存，是很不容易的事。

那些经历过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占领时期，并参与重建新加坡经济的国人，就没那么轻松自在。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不论是公共秩序、个人安全或是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与繁荣，都不是从天而降的，这一切都是一个诚实和有效率的政府专心致志，孜孜不倦地努力所换来的成果。

在上册里，我讲述了我在战前新加坡和日治时期的经历，以及我在面对共产党人引起的动荡和跟马来西亚合并那两年的种族纠纷的心路历程。

在日治时期（1942—1945年），日本人残暴地对待其他亚洲人，使我和我的朋友内心燃起仇恨的火焰，也激起我们的民族主义和自尊自重的感情。我们痛下决心不让他人欺凌或虐待。战后我到英国留学四年，这种出自内心的反应更加强烈了，它激发我产生了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欲望。

1950年，我返回新加坡，当时我对自己的反殖事业充满信心，可是，对于前方的陷阱和危险却懵然不知。反殖浪潮席卷了全球许多跟我同时代的年轻人，我参加工会和政治活动，组织政党。1959年，年方35岁的我成为新加坡自治民选政府的总理。我和朋友们跟共产党人组成了统一战线。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彼此迟早会分道扬镳，早晚要算账。斗争到来时激烈万分，幸好我们没有被打败。

那时，我们认为新加坡未来的长久之计是重新加入马来亚，因此在1963年9月，我们跟马来亚合并组成马来西亚。但是不到一年，也就是在1964年7月，新加坡发生了马来人和华人冲突的种族暴乱。我们陷入了同执政党巫统的马来极端分子不断纠缠的斗争中，他们一心一意要建立一个由马来人支配的社会。他们通过种族暴乱来吓唬我们。我们则通过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团结马来西亚各地的非马来族和马来族，争取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到了1965年8月，我们别无选择，只好脱离马来西亚。

种族欺侮和恐吓事件，使新加坡人情愿容忍独立自主所面对的艰辛。种族暴乱的惨痛经历，也促使我和同僚们更加坚决地下决心建设一个平等对待所有公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多元种族社会。多年来，我们制定政策时都坚守着这个信念。

这一册阐述了我们在没有马来西亚作为腹地的情况下，尝试以各种方式维持独立地位和生存下去的漫长艰苦的路程。我们越过一道道看起来不能逾越的障碍，在30年内把新加坡从一个贫困的小岛发展成富强的国家。

1965年后的日子非常忙乱也充满了焦虑。我们还在寻找立足点。英国在1971年从新加坡撤军时，市场上已有足够的就业机会，使我们避过了严重的失业问题，让我们松了口气。直到我们在1973年安然渡过全球石油危机，从容应付了油价上涨三倍的问题时，我们才对自己管理一个独立国家充满信心。之后，我们努力工作、策划和随机应变，把新加坡建设成一个能通过贸易和投资，跟主要工业国联系起来而生存的国家，同时作为一个在本区域成功转口货物、提供服务和传播信息的枢纽。

正当世界经历非常大的政治和经济变化的时候，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59年（我就任总理时）的400美元，增加到1990年（我卸任时）超过1万2200美元。1999年则是2万2000美元。从物质方面来看，我们已远离第三世界所面对的贫困问题。然而我们还需要多一代人的时间，艺术、文化与社会行为水平，才能同我们所发展的世界级基础设施相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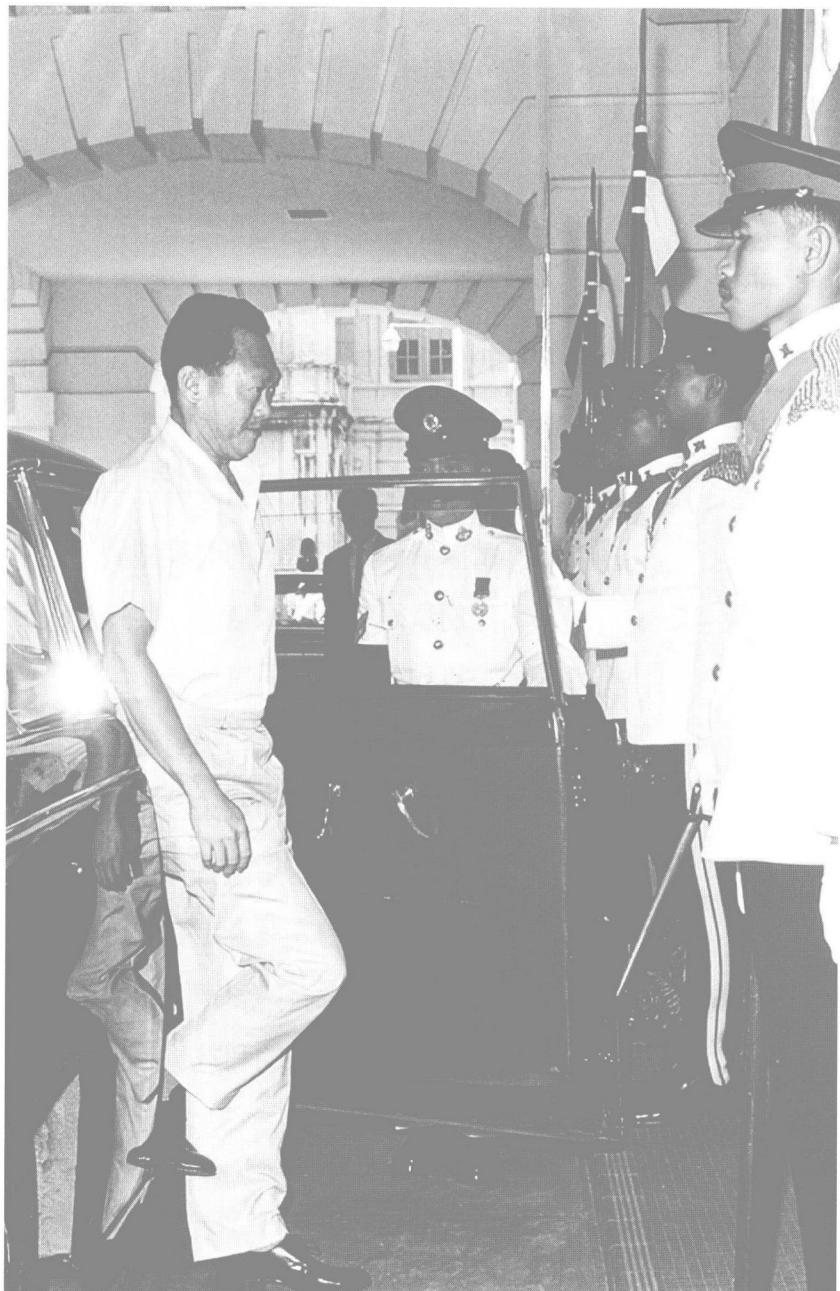
60和70年代的冷战时期，在哪一方会获胜还是个未知数时，我们选择同西方为伍。冷战使国际环境更为简单。当时我们的亚洲邻居们都反共，所以我们既能享有区域团结，也能享有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国际支持。到了80年代末，我们很明显地是站在胜利的一边。

这不是一本教你怎么发展经济、建立国家或军队的手册。它收录的是我和同僚们所面对的难题，以及我们如何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上册是编年叙事。要是这次也这么做，恐怕篇幅会过于冗长。所以我决定按照主题，把30年的故事压缩成800页。

李光耀 新加坡

走自己的路

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就是获得人民的信任。通过为人民跟共产党人进行斗争，抗拒马来过激派，并在中央政府掌握着警察和军队的时期威武不屈，我们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共产党人嘲笑我和我的同僚是殖民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咒骂我们是马来封建主义者的仆从和帮凶。然而在关键时刻到来的时候，人民（包括抱着怀疑态度的说华语或方言的左倾人士在内）目睹了一群受英文教育的资产阶级领袖挺身而出，维护他们的利益……



我们在1965年8月9日迫不得已宣布独立。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同年12月8日我来到国会大厦，出席第一届国会的开幕典礼。

怎么盖房子、怎么修理引擎、怎么写书，都有专著教导。但是从没见过有这样的一本书，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英属印度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不同移民塑造成一个民族国家，或者如何在岛国转口贸易港的传统角色已经过时的情况下，养活岛上的人民。

我从没想到自己在42岁的时候，得负起管理独立的新加坡的重任，照顾200万新加坡人民的生计。1959年我35岁的时候便成为新加坡自治邦的总理。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但是，新加坡和联邦政府在政策上存在着基本的分歧。突然间，我们在1965年8月9日迫不得已宣布独立。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从。

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它原是个贸易站，英国把这个贸易站发展成为它全球性的海上帝国的一个枢纽。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

使我更觉得沮丧的是，外国评论都预测独立后的新加坡将走投无路，一名评论员甚至把英国从殖民地撤出的情况跟古罗马帝国的没落相比。他指出，当古罗马军团撤走，外邦人接管后，古罗马帝国的法纪全垮了。丹尼斯·沃纳在《悉尼先驱晨报》（1965年8月10日）写道：“三年前，新加坡独立是行不通的概念。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它依然是行不通的。”《星期日泰晤士报》（1965年8月22日）的理查·休斯说：“花费超过1亿英镑建成的英国基地一旦关闭，新加坡的经济将会垮掉。”其实，我也有相同的忧虑，却没表露心中的感受。我的职责是维持士气，为人民点燃希望，而不是打击他们的信念。

我最关注的问题是，对新加坡的基地英国会保留或能保留多久。他们会不会因为新马分家的方式而缩短留下来的时间。威尔逊首相已经面临后座议员的反对，对他们来说，在苏伊士运河以东驻军的政策代价太大，不得人心。这个政策对工党政府争取选票毫无帮助，他们需要拨款作为福利和其他能赢得选票的用途。

只有一个国家能保障东亚的安全和稳定，那就是美国，但是美国却在越南游击战争中泥足深陷，它的欧洲盟友和亚非政府都非常不喜欢这场战争。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美宣传在第三世界收效很大。我认为，新加坡要让美国继承英国所扮演的角色，要不是不可能，就是政治代价很大。单靠澳洲和纽西兰则又威望不够。

我担心的是，英国对本区域的影响会无法避免地、慢慢地削弱，反之美国的影响将扩大。我们这一代在帝国时代成长，这样的改变不容易适应。少了英国扮演缓冲角色，我只能向美国势力妥协。英国人在行使他们的意志时，总还客客气气。美国人就不同。我可以从他们怎样对待南越领袖，甚至是那些处境没西贡那么糟的泰国和菲律宾领袖看出来。美国是个如日中天的强国，肌肉发达，惯于耀武扬威。

此外，我还有加强个人保安措施的累赘。这真是令人厌烦。分家后，负责保护我的警官曾经提醒我，马来西亚的马来文报章、电台和电视台已把我视为最可恨的人。当时，这些报章仍在新加坡发行，电台和电视台的广播，新加坡也收听收看得到。后来，他又进一步劝我搬离欧思礼路的住家，直到他们改装好我的住家之后，才搬回去。保护我的保安人员人数也增加了，原本只有一个。他考虑得周到，也暗中保护芝和孩子们。种族狂热主义者所造成的威胁是防不胜防的，他们不像共产党人那样理智而深谋远虑。共产党人知道对付芝或我们的孩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我和芝有三四个月是暂住在樟宜别墅，那是一座靠海的政府度假屋，位于“受保护地区”范围内，附近是樟宜皇家空军基地。那时我不定期地召开内阁会议，每次开车到政府大厦开会，会有一辆保安警卫车跟着，前面则有车队开路，交通因此受到干扰。在必须做紧急决策时，我会跟有关部长进行电话会议。这使我得以从没完没了的会议中抽身。由于我在度假屋办公，所以我的私人助理和我那忠心耿耿的内阁秘书黄水生，得天天到那里去。离度假屋不远是皇家空军的九洞高尔夫球场，它让我在处理

源源不断的文件和记录的日子里，得以放松身心。我会打九个洞的高尔夫球，有时跟一位朋友一起打，有时自个儿打。芝总是在一旁陪着我走来走去。

三个孩子还得上学，所以只好留在家中，忍受工人建筑一道状似蜂窝的围墙所造成的不便。建筑围墙是要把我们前门的门廊和公路隔开。在防弹玻璃还没运到以前，他们暂时用钢片封住窗口，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牢房里生活一样。几个月后，工人终于装上玻璃窗，我们全家才如释重负。当我回到欧思礼路住家时，已有辜加警察（英国人从尼泊尔招募来的）在站岗。我想，不论是华族警察向马来人开枪，或是马来警察向华人开枪，都会引起广泛的反响。而辜加警察是中立者，他们以绝对的纪律和忠诚著称。这一切安排令我倍觉不安，也凸显了建立一支军队来保护这个脆弱的独立国的迫切性。

我面对许多急务，首先是争取世界各国承认新加坡的独立，包括加入联合国。我委任拉惹勒南（我们称他拉惹）为外交部长。他是个非常适合的人选。战前和战争时期他在伦敦求学就已经以反殖民主义见称，但却不是激进派。他友善、诚恳、温文尔雅，懂得在坚持立场和外交妥协之间，取得准确的平衡。不论在国内或在海外，后来跟他共事过的人都很爱戴和尊敬他。随着越来越多国家承认新加坡的独立，副总理杜进才和身为外交部长的拉惹，在1965年9月一起启程到联合国，坐上了新加坡的席位。

我关心的第二件事是保卫国土。我们没有军队，两营新加坡军队是由一个马来西亚的准将指挥的。要怎么样才能很快地建立防卫力量，哪怕有多单薄？我们必须吓阻和预防吉隆坡的马来过激分子煽动在新加坡的马来西亚部队闹政变，剥夺我们的独立。吉隆坡的许多马来领袖都认为绝对不能让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是应该狠狠地打击新加坡，一直到它屈服为止。如果东姑遭遇不测，拉萨将出任首相，那些强硬的过激派领袖可能迫使拉萨推翻东姑的决定。那真是一个岌岌可危的时刻。

在全力应付这些主要事务的同时，我也得顾及迫在眉睫的治

安问题。我们担心在获知已被马来西亚政府遗弃而再度成为少数族群时，亲巫统的马来人会失去理智，胡作非为。我们的警察多数是来自马来亚甘榜的马来人，如果要他们采取行动对付想重归马来西亚的马来暴徒，他们的忠心就会承受巨大的压力。我们两个营的军队，多数也是马来亚的马来人。

所以当我知道吴庆瑞愿意也渴望负起建设国防的重任时，我很宽慰，立刻委任他主管内政和国防事务，两者归入一个部门，称为内政兼国防部，英文简称MID。这一来，吴庆瑞便能够动用警察部队，协助进行新兵的基本训练。（时至今日，新加坡武装部队的车牌号码，仍然冠以MID三个英文字母。）不过这一来使得财政部无人领导。我和庆瑞讨论后决定让林金山出掌财政部。林金山总是采取务实的态度来解决问题，更何况他能跟庆瑞融洽合作，这样，庆瑞就能在财政政策上随时贡献个人的意见。

最头痛的问题是经济

我的第三个也是最头痛的问题是经济：如何让人民得以维持生计？印尼正同我们对抗，贸易活动停止了。马来西亚人想利用他们自己的港口，不经过新加坡直接跟所有贸易伙伴和出入口商做生意。如今新加坡已不再是英国统治的广大地区的中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新加坡要怎么生存？我们必须理出一些头绪，因为当时的失业率高达14%，而且有上升的趋势。我们还得让人民以跟英国统治时期大不相同的方式来谋生。过去，工人辛勤地在仓库里为堆得满满的橡胶片、胡椒、椰干、白藤进行处理和分级，为出口做好准备。但是，这些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原料都不再进口来加工处理和分级了。由于其他国家都不像新加坡，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尝试采用世界其他地区从未尝试过的新方式。跟我们最相似的香港当时仍然受英国统治，而且有中国作为腹地，在经济上它几乎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跟资本主义世界非共国家进行贸易的中介。

思量了这些问题和眼前的有限选择之后，我得出结论，这个